

荀子重相论释义

李加武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由于宰相在官僚系统中处于百官之首的地位,所以择相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君主个人的荣辱存亡,更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现实福祉。因此,荀子对宰相自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强调其在“行”上的能力,也十分注重其在“知”上的功夫,除此之外,他非常重视宰相的道德修养,要求宰相能够做到仁且知。同时,荀子要求君主在选拔宰相时要抱着求贤若渴的态度,公正不偏私,在任用时要给予其充分的信任与权力。

[关键词] 荀子;相;君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5)06-0043-04

Interpretation of Xunzi's Views of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Chancellor

LI Jiawu

(Center for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Because chancellor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bureaucracy, the choice of chancellor counts greatly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t's not only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monarch, but also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working people. Xunzi not only highlighted chancellor's ability to act, but also highlighted chancellor's ability to know. In addition, Xunz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elf-cultivation of chancellor, asking chancellor to perform benevolence and wisdom. In the meantime, Xunzi also asked the monarch to perform impartially and seek talent with eagerness when appointing the chancellor, and give him enough trust and authority.

Key words: Xunzi; chancellor; monarch

君权与相权的合作与斗争一直是伴随着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对于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和淑世意识的先秦儒家来说,如何合理地确立宰相的地位与作用、妥善处理君相关系,不仅关系到君主个人的荣辱存亡,更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现实福祉,因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作为先秦儒家殿军人物的荀子,已充分认识到宰相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宰相的地位、职责与选拔标准予以了全面的讨论,形成了深刻而有系统性的重相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和理论高度,因此,有必要单独提出并予以详细地论述。

一 荀子重相的原因

对于实行君主制度的古代中国来说,取得政权的方式无疑只有两种,即世袭和革命。于前者而言,君主世袭制度虽然可以保证政权转移过程的平稳性,防止社会因之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与争夺,但是却无法保证嗣君的贤德。也就是说,“德”与“位”可能无法像理想中的情况那样,完美的结合于君主一身。在君权既定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君主在德行上的欠缺,就必须任用有德慧智术的贤才,这样既能维护君主作为天下象征的至高尊严,防止社

收稿日期: 2015-01-13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究”(11ZD086)

作者简介: 李加武(1985-),男,安徽舒城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

会因之陷入无休止的分裂与混乱,又能发挥贤才在经邦治世方面的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现实的福祉。而任贤使能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作为臣属代表的宰相的选择上,这是因为宰相在官僚系统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王霸》)。正是由于宰相的特殊地位,所以荀子才说:“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王霸》)。择相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位者不可不慎。

于后者而言,既然取得政权的方式是革命,那么,这样的政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非理性的。“君主通过‘武器的批判’获得政权,其他人自然没有资格在这一层面上说三道四。如果要讨论的话,也只能是如何帮助君主更好地守住这‘马上’得来的‘天下’。”^{[1]189}因此,“典型的儒生,却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最高理想定位在入阁拜相上。儒术无能于夺取天下,却有助于治理天下。”^{[1]189}对于君主来说,也有任用贤才的需要。君主虽然是国家权力的中心,然而若仅凭其一人来管理国家事务,“非特事有所难,势亦有所不可”^{[2]72},《王霸》篇说:

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顿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3]213}

荀子认为,若凡事都由君主亲力亲为,这样不仅使得君主自身“劳苦耗顿莫甚”,而且也未必真能治理好国家。为了达到“以一人兼听天下”和“日有余而治不足”的治理效果,君主就必须“使人为之”,即与贤人共治之,而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选贤任相。若能选择合理的人才担任宰相之职,并给予其充分的信任与权力,君主就能“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否则就会陷入“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的窘境。所以,荀子将选贤任相看作君主应当履行的最重要职责,“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王霸》)。同时,这也成为区分“明主”和“闇主”的依据,“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执。”

相,副也、贰也,它作为君主最高级别同时也是

最重要的辅佐者和助手,本身的贤愚臧否不仅关系到社稷的盛衰,同时也关系到君主的存亡。荀子在《解蔽》中以史为鉴,指出: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桀死于亭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3]389}

他以夏桀殷纣为例,指出桀纣师心自专、任用小人,致使朝纲紊乱、百姓怨诽、贤良退隐,最终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选用良相辅佐自己。有鉴于夏桀殷纣的下场,成汤与文王谨慎为国,选贤任相,受天九有,成就治道,“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因此,对于君主来说,要达到仁智且不蔽的根本途径就是选贤任相并倚重之,远者如成王之于周公,无所往而不听,近者如桓公之于管仲,无所往而不用即是其例。

另外,荀子处于由七雄争霸到秦朝建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前夕,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已达白热化,合纵连横逡巡往复,大规模的战役也时常爆发。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争相延揽人才,以增强自身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力,这也是荀子十分重视尚贤使能的现实原因,所以他说:“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而尚贤使能的措施最终体现在择相上,乃在于宰相是百官之首,故不得不予以重视。

二 相的职责

众所周知,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学,正如王先谦所说:“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旨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3]1}在社会政治领域,荀子主张“以礼明分”,即根据礼的精神与原则明确社会的分工与等级,进而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荀子主张以

“礼”划分“主相臣下百吏”各自的职分,同时要求他们“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王霸》),在他的设想下,只要社会成员都能做到“敬分安制”,那么国家就能达到治理的状态。而在礼分原则下,宰相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对此,荀子提出“主道知人,臣道知事”的施政原则。荀子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君主根据不同社会成员的才性与智能,合理安排他们的职位,明确他们的责任,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因此君主的责任是“知人”。同时,荀子进一步指出:“主道知人”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宰相的选择上,所以他说君主只需“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就够了,剩下的具体事务应该交给宰相处理。“这样的职责划分,不仅有现代君主立宪制中‘虚君’的意味,更是将实际政治事务的治理权牢牢掌控在相的手中。”^[4]在“主道知人,臣道知事”的政治原则下,宰相所知的又是哪些具体事务呢?《王霸》篇说: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3]224}

在荀子看来,宰相的职责是审查并甄别百官才能的优劣,考察校理百事的得失,明确各级政府机关的职责与权力,仔细斟酌百官的业绩,并给予相应的赏赐,等到岁末的时候,再向君主汇报各级政府机关在这一年工作的得失。对于百官有司,称职的就加以留用,不称职的就予以废置。荀子不仅强调宰相在“行”上的能力,也十分注重其在“知”上的功夫,在他看来,“行而不知”或“知而不行”都失之偏颇,“知行合一”才是理想的状态。那么,宰相应该知道哪些东西呢?《君道》篇说:

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3]245}

荀子认为,宰相应该知道推崇礼义就是尊君,礼贤下士就是己之美名,爱护百姓就是安定国家,事有常轨就是齐一风俗,尚贤使能就是助长功业,重农抑商就是增加财富,不与民争利是为了便宜行事,明确制度、权量物宜是为了不拘泥、不固执。只

有意识到了以上八项,做事才有所本。可见,荀子十分重视对宰相的认识水平和大局观念的考察。荀子不仅非常重视宰相在“知”“行”方面的能力,同时他也十分看重宰相的道德修养水平,并要求宰相能够以自己的德行对君主施加影响,《臣道》篇说: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卹君之荣辱,不卹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3]254-255}

荀子理想中的宰相是周公,同时,他也比较推崇管仲。在荀子看来,周公对于成王是大忠的代表,原因在于他能“以德覆君”,即以自己的德行涵化其君;管仲对于桓公是次忠的代表,原因在于他能“以德调君”,即以自己的德行辅成其君。另外,荀子尤其重视宰相的尚贤使能,并对其予以特别强调。《强国》篇记载了荀子与齐相之间的一段对话:

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术,豈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术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3]295-296}

荀子认为宰相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在任用贤才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他位居人臣之极,在上得到君主的倚重,在下可以专主国政。如果宰相能充分利用自身的这一优势,任用仁厚明通的君子,与他们一起参理国政、正定是非,那么,全国上下都会趋身赴义。君臣上下贵贱长少以至于庶人都甘愿为义,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有义的国度,而天下人哪有不欲与有义之国相结合的呢?如此,贤能之士都愿意到这样的朝廷为官,普通百姓都愿意到这样的国度生活,势将使天下归于统一。

三 选相的标准与原则

荀子指出,君主任用宰相乃出于“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治

国驭民,调壹上下”“内以固城,外以拒难”的治理效果。然而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目标呢?这势必对宰相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君道》篇指出,宰相“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在这里,荀子提出考察宰相自身能力的两条最重要标准,既仁且知。仁,泛指宰相的道德修养水平,知,泛指宰相的实际行政能力。只有在以上两方面都具备很高的水准才能成为合格的宰相,才能称为“人主之宝”“王霸之佐”。同时,荀子也提出君主在选拔与任用宰相时应该遵循的原则:“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君主在选拔宰相时,要充分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性,要抱着求贤若渴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贤才归附。在得到贤才以后,要给予其充分的权力与信任,不要“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如果是那样的话,贤才就会处处受到掣肘,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君主“欲安”“欲强”“欲荣”的初衷也就无法达成。同时,荀子指出,君主在选拔宰相时要做到公正不偏私。《王霸》篇说:

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治国驭民,调壹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3]241-242}

荀子以选拔射手和驭者为例,君主为了得到技艺高超的射手和驭者,就必须以候选者的技能为唯一的选拔标准,既不能偏向于子弟,也不能遮蔽远方的贤者。同理,人主在选拔宰相时,也应该秉持公正的态度,不应偏向于左右亲近的人。荀子特别指出,自古以来多有因为选任宰相不公、任用亲近导致国家覆亡的事例,“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强,俄则弱矣;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则亡矣。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他故,莫不失之是也。”他为选用人才贵公不贵亲寻找历史的根据,指出“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

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即文王在选拔卿相时不偏私、不贵亲,起用身为布衣的太公,最终成就“举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的伟业。因此,人君“欲白贵名,以惠天下”,那么他在选拔宰相时就必须以公不以私。

以上分别从重相的原因、相的职责以及选相的标准与原则三个方面分析了荀子的重相思想,足见荀子的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性与系统性。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荀子之所以十分重视宰相的作用是与他的尚贤思想完全一致的。正因为他清楚意识到贤才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才要求将他们选拔到官僚机构中最重要位置上,并予以充分的信任与权力。无论是荀子的尚贤思想,还是他的重相思想,都向我们透露出其理论系统中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取向,而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先秦儒家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救世情怀。另外,荀子在注重考察宰相行政能力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宰相的道德修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仁且知的用人标准。这与当下我们正在积极倡导的以德养廉的理念若合符节,“养廉虽然受到社会政治体制、法制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与领导干部政德修养密切相关。”^[5]事实表明,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越高,他们服务民众的宗旨意识就越牢固,对社会和人民就越有利。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和为政的清廉指数是成正比例的。^[5]足见荀子在两千多年以前提出的选相用相标准,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韩德民. 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2] 陈登元. 荀子哲学[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4.
- [3]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4] 蒋瑞. 荀子君相观[D]. 南京: 南京大学历史系, 2011.
- [5] 夏云强, 邹兰香. 《大学》政德修养思想与当代领导干部的以德养廉[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82-86.

责任编辑: 黄声波